

●文学与文化

关于《文心雕龙》中“理想作家”之探讨及还原

薛宝生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历代作家多有臧否,上至羲皇上人,下及宋齐之世。而臧否本身就包孕着某种品评标准,符合该标准的或以“梓材”方之,也即笔者所谓“理想作家”。又因其采用旁见侧出式的评述模式,故而使得品评标准散落、隐约。本文试图从品评模式入手,就作家的德、才、学、识以及作家的“理想人格”定位等方面加以考察,力图勾画出一个完整的“梓材”评价标准,也即还“理想作家”一个本来面目。

关键词:刘勰;梓材;理想作家;圣人;君子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3)04-0055-05

An Explo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Perfect Writers in *Wen Xin Diao Long*

XUE Bao-sh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Liu Xie gave a criticism of ancient writers from Fuxi emperor period to Song and Qi dynasties in *Wen Xin Diao Long*. The comment also included certain judge standards. Liu Xie rated some people as “Zi Cai” in line with the standard, namely “the perfect writer” called by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Liu Xie adopted a type of collective comment model, as a result, the standard was scattered and vagu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his judge models to examine the writers from their morality, ability, learning and insight and positioning the perfect writer in personality. Finally, the paper sketches out an intact standard for the so-called “Zi Cai” and tries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perfect author.

Key words: Liu Xie; Zi Cai; perfect writer; saint; gentleman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以《周书》“梓材”之论引出对作家的臧否,以历代文士、将相不能兼备华实、文质而指陈其疵咎,从而提出了“梓材”(也即理想作家)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着眼于作家的德行,而忽略了作家的“才”“学”“识”等方面。事实上,《文心》(代指《文心雕龙》,下同)一书对“理想作家”的评判标准远不止此,往往散见于其他篇章中,以旁见侧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散见的标准可以与《梓材篇》互为补充,从而构成“理想作家”的全貌。

一、评述模式及旁见侧出的表述方式

《文心》一书对历代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评

述,在全书分量中约占一半左右,论文时往往是结合许多作家作品的例子来说明,^{[1]309}且多是旁见侧出式的。更多情况下,则是将同一时代的作家放在一起简要评说。也就是说,往往将作家以群体的姿态展现,这种将杰出作家与普通作家杂陈评述的模式自有其合理性,因为杰出作家并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其他作家而独立存在。如丹纳所言“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

收稿日期:2013-06-10

作者简介:薛宝生(1984-),男,甘肃平凉人,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中国古代文论。

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为显赫的一个代表。”^{[2]009}又说“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2]009}正是有了其他作家紧紧环绕在杰出作家周围,杰出作家才显得更为杰出。

然此种评述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即不能很好地突出杰出作家的典型性,《文心》一书评述作者数以百计,在群体阐述之外,并未就其所推崇的某个作家单列出来加以肯定,也未将其品德、才干、学问、识力、作品特色、源流出处、创作成就等等放在一起加以具体阐述,而是采用了旁见侧出式的评论。因而,不利于榜样的树立。且因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3]719}作家个体在艺术成就上势必会有高下之分,这种集体评述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后世作家选择榜样。以有限典型为师法,尚且会产生“才高者菟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3]48}的情形,若此集体榜样的模式,势必造成“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3]514}的局面。且如此集体评述,落实到具体作家身上仅仅只言片语,例如对建安作家的评述,散见于《明诗》《时序》《才略》等篇,《明诗》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3]66}《时序》云“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3]673}《才略》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琳瑯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楨情高以会采,应瑒学优以得文。”^{[3]700}可以看出,刘勰对建安作家的品评,着眼点在于一种“集体风格”,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创作风貌,在这个前提下兼及个体的品评,仅是只言片语。因此,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关于“理想作家”的定义是笼统的、散落的。

虽然如此,刘勰在集体把握的同时,还是在各个篇章里旁见侧出地谈了许多品评标准,主要涉及德、才、学、识几个方面。“德”字出现了52次,“才”字出

现了117次,“学”字出现了51次,“识”字出现了26次(见文后附表),且多与文事相关联。在刘勰看来,这四个方面有机统一,是一个“理想作家”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神思》篇讲“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3]493}明确要求作家要积学、富才,而“穷照”则可以看作是对识力的要求。《事类》篇讲“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3]615}此处可以看作是刘勰对“德”“才”“学”“识”的综合论述,“主”指“才”,“佐”指“学”,“所见不博”、“寡闻”即是从反面强调要有“识”,“合德”之“德”当作“德行”“道德”解(也有学者以为“合德”指“才”与“学”相合,即主与佐相合),也就是说,以“才”为主,以“学”为辅进行创作时,必须以符合道德为前提。换句话说,在刘勰看来,作家创作的过程是道德统驭下,以“才”为主,以“学”为辅的创作过程,而这个过程须有“识”力伴随始终,才能使创作入于雅正,不流于淫邪。

二、德、才、学、识的内涵及实践

从刘勰的评述来看,德、才、学、识贯穿于作家的人生价值实现和创作始终。在作家人生价值实现上,刘勰秉承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4]1088}这一精神,因而《诸子》篇讲“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3]307}《序志》言“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3]725}以上所引中,刘勰置“德”于“言”之前,即是强调作家须以“立德”为主,以“立言”为次。

“德”又有“人德”“文德”之分。“人德”指作家本身道德修养,即要求待人接物须有品行。因此,他在《程器》中历数文人之不端曰“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恂恂以粗疏……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3]719}事实上,刘勰把某些并不属人品问题而属于性格问题的瑕疵,也当成作家的品行问题来指摘,如扬雄的嗜酒少算,陈琳的草率粗疏,祢衡的傲视权贵等等。此种指摘确有吹毛求疵之嫌,必“蚓而后充其操者”^{[5]274}方可。但这恰恰反映出刘氏心目中“梓材”也即“理想作家”之冰山一角,即他认为“理想作家”在性格上应无瑕疵,才可归入有德行品操之列。“文德”主要指作家的德行修养在创作中的贯注,以遵守创作规范,特别是以遵守“廉”为规范。《指瑕》篇讲到“又制同他文,理宜

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篋,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3]394}“揭篋”“探囊”均指偷盗、剽窃之行。也就是说,在刘勰看来,抄袭者如同盗贼,同样是品行不端的。“人德”、“文德”统一于“理想作家”的“德行”要求,缺一不可。故《宗经》言“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3]23}刘勰认为,德行是立文的关键,而文章又可以传扬德行,两者彼此依赖,相得益彰。

以上陈说了个“理想作家”需要有“德”。那么,通过什么途径修养“文德”和“人德”呢?刘勰讲“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3]23}“师圣”是修“人德”的途径,而圣人的德养则表现为“内圣外王”,因而达于“内圣外王”便是“理想作家”修“人德”的最终目的。“宗经”是修“文德”的方法,经典为之楷式,达于“衔华佩实”的经典范式便是修“文德”的目的。既然“师圣”“宗经”是修德的途径,而经典又出自圣人。如此,“师圣”“宗经”便可归于一途,即“文德”“人德”皆取法于圣人。然圣人之德、圣人之文则又是取法天地、肖貌自然的结果,因此,所谓“征圣”“宗经”最后还要落实到以天地自然(即道)为宗法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上。郭晋稀先生讲“作者在《征圣》里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征圣与宗经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承《征圣》之后,提出了《宗经》。”^{[6]16}此处的“一事”盖指师法天地、肖貌自然(即体道)而言。

关于“才”,从刘勰的论述来看,可以分为创作之才和政治经营之才两个方面。其一,作家的创作之才。刘勰认为此种“才”主要取决于先天的禀赋,《才略》讲“才难然乎!性各异禀。”^{[3]702}《体性》云:“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3]506}《事类》讲“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3]299}当然,刘勰也承认后天习染在练“才”方面有一定作用,《神思》讲“酌理以富才”,^{[3]493}《体性》讲“因性以练才”^{[3]506}显然,这是从后天学习方面来要求的。其二,政治经营方面的才干,即要求作家文武兼善、出将入相。《程器》云“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毅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3]720}这里以郤毅和孙武为例,言作家应当文武兼修,并且可以文武兼善。又云“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3]720}进则能拓土守疆、建功立业,退则能著文以传世,如此才符合“梓材”的要求。这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识见,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很大

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郭晋稀先生说“他(刘勰)慨叹好文不练武,习武不晓文,又是针对当时士大夫过于文弱而发的。《颜氏家训·涉务》说:士大夫‘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纤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又说‘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歔陆梁,莫不震慑。’这种风习,不独梁代,是齐梁以来,相沿养成的。”^{[6]451}刘勰身逢其世,不免有此慨叹,进而发为一种理想。此种文武兼善的要求,作为衡量一般作家的标准确是苛刻了,但由于时代的病弱,非振作不能起其靡弱,故以此作为其心目中“理想作家”的衡量标准,却又是恰当的。

“理想作家”之学也须坚实、广博,《杂文》讲:“伟矣前修,学坚才饱。”^{[3]125}《事类》讲“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3]616}即是明证。可是,为什么要有学,且要坚实、广博呢?刘勰这样回答“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3]494}“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3]615}一是无学而成器,未曾听闻,也就在实践上不具备可能性。二是无学之作经不起推敲,自然不能符合“理想作家”作品的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坚实、广博的程度呢?刘勰讲“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3]506}“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3]647}可以看出,“慎始习”“勤”“弗怠”便是达于博而能甄别的途径,也就是在选择“始习”对象的时候要谨慎,也即是要求“师圣”、“宗经”,而且要勤而不怠。

然而,对一个“理想作家”来说,拥有德、才、学显然还不足够,还应具备“识”,《才略》讲“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3]699}又讲“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3]670}对于“理想作家”的识力,刘勰主要从“识”的内容和“识”的程度来陈说。其一,“识”的内容。《奏启》篇讲:“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3]422}《议对》讲“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3]438}只有熟悉祭、兵、农、律、礼等事,有这方面的生活实践,才能写这方面的事。由此看见,“识”在内容上侧重于生活实践和经验积累。当然,先哲的言语和行事也属于“识”的范畴。如《事类》所云“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3]614}其二,就“识”的程度而言,主要有内外两个层面。于外,对事物的识鉴要精、深、周遍。所谓“鉴周日月,妙极机神”

[3]15 “日月”代表一切显著的事物，“机神”则代表一切隐微的事物，即是要求在识见上要周遍深邃，巨细无遗。又云“是以师旷觐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3]101 “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悱，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3]715 即是要求识鉴在程度上要达到：精、深。于内，要深识文理。《附会》讲：“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豆之合黄矣。”[3]651 “凑理”，即肌肉的纹理，在此借指文章理路脉络。作家有识于文理，才能创作出浑融一体、文质兼备的作品。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识力呢？刘勰讲：“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3]715 这里的“操千曲”“观千剑”“博观”无疑指向一种实践的态度，“千曲”“千剑”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千首曲”“千把剑”，它还有一种暗含的意义指向即“千遍曲”“千次剑”，也就是一曲弹千遍，一剑观千次，只有经过这样的阶段，才能达到谙熟、理解的层次，然后再不断地叠加，直至“千首曲”“千把剑”，也就是要求不断积累反复实践，才能达到此种识力。

以上所论德、才、识、学四点，便是刘勰对其心目中“理想作家”的要求。概而言之，可归于两个方面（即内修、外养）。《程器》开篇讲“《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3]718 “器用”就内修而言，“文采”就外养而言，即要求作家要内外兼修，既要注重品德修养，又要讲求才学修养。《事类》讲“才自内发，学以外成。”[3]299 依刘勰看来，“德”有取于天、地、人之精神，“才由天资”，故属内修，“学”由后天习染，“识”乃反复实践所得，故属外养。作家如果能达到这个层次，于“理想作家”来说，亦庶几矣！

三、“理想作家”的“理想人格”定位

关于“理想作家”的定位，归根结底，也就是关于作家的“理想人格”定位。《庄子·天下》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之分：“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7]1066 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向秀、郭象注云：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异。[7]1066 且《文心》未提及天人、神人、至人，而提及圣人凡 53 次（见文后附表）。圣人是具有宇宙精神和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道德完全的人，因而圣人可以述或作。然而，刘勰要求作家“征圣”“宗经”，即是要求作家以圣人之德、圣人之文为师。也就是说，“理想作家”

尚达不到圣人的地步。原因有二：其一，圣人不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6]99 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5]377 其二，以圣人为师，未必能成为圣人。严羽《沧浪诗话》云“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8]1 显然，刘勰眼中的“理想作家”达不到圣人的标准，只能是有圣人精神传承的人。

而除却圣人外，《文心》一书谈论君子之处凡 20（见文后附表），且多与文事联系在一起，如“君子秉文，辞令有斐。”[3]408 “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3]102 等等。那么，君子是否符合刘勰心目中“理想作家”的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序志》云“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3]725 《程器》云“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3]720 刘勰明确说明了君子“应梓材之士”，也就是说君子符合其“理想作家”标准。究其原因，其一，君子具备创作的可能性。《论语》云“有德者必有言”，[5]149 且此种人往往能“道中庸”而不能“极高明”，[9]16 也就是说君子是即世间的、现实的，因而具备创作条件。其二，君子有才、德。《论语》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93 又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76 “文质彬彬”“重义轻利”便是君子才德的写照。其三，君子善于蓄学养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也。”[3]614 凡斯种种，说明了君子的才德学识符合“理想作家”的标准。

那么，作家一旦拥有君子人格，且达到德、才、识、学的要求，在创作上以圣人之文为榜样，他应该创作出怎样的作品呢？《征圣》篇讲“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3]16 圣文“衔华佩实”，以圣文为师法，势必要以“衔华佩实”为标准，因而“衔华佩实”便是对作家作品的要求，即要求作品要内容形式兼重，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状态。王运熙先生讲：“刘勰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不但在于它们应当有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等艺术特征方面，他还认为文采华美的特点应当与质朴雅正的特点相结合，做到有文有质，文质彬彬。这是他对于作品的艺术标准。”[1]207

从德、才、学、识的具体要求到君子人格的定位，再到“衔华佩实”“文质彬彬”的作品创作标准，符

合这些条件的作家到底有哪些呢?或者说,刘勰自认为符合“梓才”即“理想作家”标准的又有哪些人呢?《程器》讲“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3]719}屈原、贾谊等便大略合乎刘勰理想作家的标准。此处,又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仅仅只有以上几位作家符合“理想作家”的标准吗?显然不是。除了屈原、贾谊等,刘勰论文时还多次提到并推崇一些作家,如曹植、曹丕、张衡等(其中提到曹植 25 次;曹丕 15 次;张衡 18 次,见文后附表),散见于《文心》各篇的论述中。

刘勰以屈原、贾谊等为理想作家,钟嵘以曹植、陆机、谢灵运为理想作家,其《诗品》云“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10]19}王静安以屈子、渊明、子美、子瞻为理想作家,其《文学小言》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1]879}可见,品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同,有多少品评标准,就有多少种关于“理想作家”

的答案。正如《知音》篇所言“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偶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3]714}因此,本文置“理想”二字于作家之前,名为关于《文心雕龙》中“理想作家”之探讨及还原。

综上所述,刘勰所谓“梓才”也即“理想作家”的标准就是:以圣人之德、圣人之述作为师法对象,人品和学品皆符合君子,性格上无瑕疵,才干上能出将入相,学问至于广博坚实,识见精深周遍,创作上能文采与风骨兼顾,内容与形式并重,达到文质彬彬的中和之美。符合此标准的作家,可以“梓材”方之,即为刘勰心目中的“理想作家”。刘勰处处以圣人之德、才、学、识及圣人之文作为要求“理想作家”的标准,而在落实过程中,这种“理想人格”却终沦入君子之列。《文心》一书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创作技巧,并在风骨、声律、练字、情采、熔裁、体性、神思等多方面进行探索,试图建立起一种属于“理想作家”的创作技巧范式,而事实上这些探索却无一例外地时时“征圣”,处处“宗经”,因而这种范式自始至终都不能摆脱经典的影响,而“终入环内”。^{[3]23}

附《文心》中相关关键词统计表^①

关键词	出现次数	关键词	出现次数
德	52 次	圣(或圣人、圣贤、玄圣等)	53 次
才	117 次	子桓(或魏文、文帝、魏文帝)	15 次
学	51 次	张衡(或平子)	18 次
识	26 次	曹植(子建、陈思、思王)	25 次
君子	20 次		

注 释:

① 统计表中,凡《隐秀》篇中补文部分有涉及关键字者,一律不计入;另外关键词有以书名形式出现者,如《封禅》中“陈思《魏德》”,“德”以书名形式出现,故不计入,才、学、识同。

参考文献:

- [1] 王运熙. 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 [法]丹纳. 艺术哲学[M]. 傅雷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 [3]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 朱熹. 四书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6] 郭晋稀. 文心雕龙注译[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 [7]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8]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9] 冯友兰. 新原道: 中国哲学之精神[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7.
- [10] 曹旭. 诗品笺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1] 郭绍虞. 历代文论选(第四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